

把军工人呈现到文学舞台

□阿莹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负有盛名的军工大院内，又在这座军工厂里参加了工作，后来又参与过军工企业的管理，尽管后来我离开了难以割舍的军工厂，但我依旧对军工人一往情深，依旧和一帮工友保持着热络的联系，几乎年年都要与他们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那些看似乏味的酸甜苦辣，那些听着不很入耳的粗俗玩笑，那些有些夸张的过五关斩六将，让我心里很受用也很过瘾。是，工厂的故事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军工人也深深地渗透到了我的血液里，也正是他们朴实的情操，让我在纷繁中能够冷静，也让我陡生了一种责任。

军工人有着普通工人一样的欢喜和烦恼，需要和普通人一样的柴米油盐，他们跟共和国一样经历了种种磨难，即使个人蒙受了难以承受的屈辱，即使心爱的事业跌入了低谷，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始终不变。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兵器试验场，参试的反坦克导弹发生故障，一个年近花甲的工程师毅然上去拆卸了令人胆战心惊的弹头，只为能保证试验的计划节点。而让我为之动容的，不仅仅是工程师的果敢，还有他腰间系着的红腰带。可以说，正是军工人这样忘我地奉献，我国的国防事业才能不断发展，才能成为当今世界一支不可轻视的正义之师。

军事工业是大国重器的诞生地，数代军工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默默无闻地劳作着拼搏着，

形成了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勇于奉献的军工精神，为共和国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生活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在文学艺术的舞台上几乎看不到军工人的形象，其实他们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与普通人一样有痛苦也有悲伤，他们与共和国一样，沐浴过建设的热浪，经历过前进的磨难，也获得过成功的喝彩。

所以，把军工人呈现到文学舞台上是我的梦想！

为了寻找从生活中走出来的艺术形象，我翻阅了我的父母和数十位老军工的档案，那厚厚的牛皮纸袋，浸润着老军工的汗水和泪迹，装着他们的人生，也装着他们的灵魂。那已经远行的我的父母、我的师傅、我的领导，又微笑着向我走来，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让我禁不住想跪下了。我翻阅了几部军工企业的厂志，那波澜壮阔的生活，那艰苦卓绝的努力，那给共和国带来激情和荣耀的故事，像画卷一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让我沉浸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而不能自拔。我还借阅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日报》和《陕西日报》，两人多高的合订本，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就

像在阅读一部生动的共和国的发展史，其中融进了人物的背景，让作品中的人物在那般氛围里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还有朋友提供了共和国经历的几次战争的资料，让我深刻理解了军工与战士、军工与战场、军工与国家的关系，让我不得不陷入了多重思考。

我想，这是我们不该忘记的“角落”啊！

于是，在2017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开始在工余动笔创作了，当年秋天我便写完了20多万字的初稿。我将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故事的开头，因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军工力量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这也与我国现代工业的发展相同步，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大幕启动的1978年。故事是在一个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过程里进行的，这个时期的人们有着特定的语境和行为，几乎人人都渴望成为时代的建设者，而我国正是积累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基础，才催生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领域的改革开放与农村略有不同，是自上而下逐步开始的。所以在小说的结尾，我没有设置光明的尾巴，而是将人物放置到大潮将至的氛围中，让人物更真实更纠结，也让读者对改革开放更期待！

最后我要说的是，尽管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是我做了多年的准备，曾经先后和几位大家做过探讨，可工作事务异常繁忙，只能在放下重担之后开始构思。在创作过程中，我试图摆脱以往工业题材喜欢围绕技术或改革方案争执的习惯，着力从描写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来展示人物的个性和色彩。而且，我将人物放入工厂巨大的齿轮中去咬合去博弈，以更好地展现人物内在的性格。也就是说人物的喜怒哀乐都发生在工厂的大墙里，而没有仅仅将工厂作为一个背景来描写。

当然，我知道自己的文字幼稚，能否驾驭这般题材，心里始终是忐忑的，因此我开始了一遍又一遍的修改，如今有记载的修改已有15稿之多了，都不好意思说写了多少根笔，积了多少厚实的底稿。而最为重要的，每次完稿搁笔之后，我都要送给不同的人去阅读，多是作家学者朋友们，大家看得认真无比，得到的意见都是良言，几乎都在以后的修改中得到了体现，也使得这部小说渐渐地丰实起来，似乎人物也赋予了灵性，我这才敢把书稿投给出版社和杂志社了。

所以，我要向所有的审稿者致以深深的谢意。

山草织鞋成追忆

□龚志政



青山连绵，草木丛生。滇西灼人的烈日下，一个腰身佝偻的老人，在山箐边的岩石缝间专注而又吃力地拔一蓬笔直苍劲的山草。只见他左手扒在石头上，右手拇指向下、掌心向外，沿两尺余长的山草半腰处捋了一把，茧掌握紧，随即旋转，将数根山草形成一圈绕在拳头上，猛一使劲，一把倔强的山草瞬间连根带绒被拔离泥土。箐边山草茂盛，两三锅旱烟的工夫，他身上挎的那个小竹篮就装满了。

老人从箐里出来，气喘吁吁地爬到山半坡一块叫龚家坟山的平地。几头黄牛悠闲地在山坡上吃草。老人的儿子，彼时八九岁的我，正寻了一个躲避骄阳的好地方，在老祖坟那个宛如石屋的墓碑里看小人书。老人转悠到了我跟前，说要带我去看一家坟。我听话地跟在他身后，来到龚家坟山右侧斜坡上，一家孤零零的坟前。墓碑简陋，我看到坟主人的名字叫“龚朝品”。

“这是你大伯的坟。”父亲说，“里面只埋着他的衣裳。”

“啊！”我吃惊不已，这之前我从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大伯，并且这可是我第一次听说衣冠冢。

“我大伯他怎么啦？”我好奇地问。

“他解放前去当国民党兵，后来毫无音信。你奶奶想念他，于是埋了这家坟。你能看出这坟有啥名堂吗？”

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这坟头正对的方向是松坪哨垭口，当年你大伯是从松坪哨垭口走出平川的。你奶奶希望他漂泊的孤魂能够找到回家的路！”

“哦……”我听得懵懵懂懂，还想从父亲口里打听点什么，可他却转身走了，留下我呆呆地伫立在大伯坟前。

屋外山风呜咽，屋内灯火昏暗。父亲身系弯木腰盘，双手在鞋架前翻来绕去、穿梭挥舞，异常娴熟地打草鞋。从山上拔回来的山草，要先晾晒干，然后用水浸泡，再用木槌反复拍打，待柔软有韧劲后，搓成数根均匀的细绳。搓草绳时，父亲还将一些破旧的细布条掺在山草里，增加耐磨性和舒适性。为了确保鞋底草绳经纬纵横的密织性，编织过程中还要不时地用一根槌棍敲竖拍，捶打结实，这也许就是将编草鞋称为打草鞋的原因吧。

父亲一年四季都穿草鞋。寒冷的冬天，他的脚上开了很多个皴裂的口子。他打草鞋累了，便在大火塘边往黧黑的脚裂子上涂抹猪化油，不时还将脚掌伸到火焰上烘烤，猪油发出滋滋的声响，看得我倒吸一口凉气。我没穿过草鞋，但一双胶鞋要穿大半年，连换洗的也没有，更别说穿什么袜子了。胶鞋里面被脚汗浸泡溼透，又脏又臭，为了次日早上能穿干鞋，我也凑在大火塘边烤胶鞋，于是老屋屋顿时弥漫着古怪的味道。这样的场景成为我和父亲心酸却又美好的记忆。

就在火塘旁，我老缠着父亲讲大伯的故事。但目不识丁的他，从来就没法讲个清楚透彻。倒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等我读到初中时，有一天，父亲有些郑重其事地从老屋东山墙与房梁相间的缝隙处，取出一个发黄的牛皮纸包递给我，说这是大伯写给家里的信。

我如获至宝。

从小学唱一支歌

□张蓬云

抗战胜利了，堂姐却不知了去向。

堂姐刚20岁，是小学教员，人很漂亮，也挺文静。平时就是上学校，下课回家，也没有什么朋友，她能到哪儿去呢？家里人跟亲戚们都着急又担心。一阵火急火燎的着急过后，她妈想起来了，说是快到年（1945年）底的一天，姑娘从学校回家比平日早。到了家，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就到自己的屋子里收拾衣服。她妈觉得是天气凉了，闺女找天冷穿的小棉袄吧。她的一个女同学来找她，两个人就在房间里说话。不大工夫两个人就出来了，堂姐把一张纸条放桌子上说：“回来让我爸看看。”说完俩人就出去了。当妈的还随后笑说：“啥事还非得让你爸看，欺你妈不识字。”

堂姐的爸爸在中街有间卖文房四宝的小门市，开门早，关门晚。这天回家就有点天擦黑了。

进了家门，看见孩子妈正操持晚饭，他就脱外衣、洗手。顺口问：“孩子们一个没回来？”老伴说：“小子在隔壁玩呢，姑娘跟同学出去了，留个纸条说让你看。”堂姐爸一看说：“坏了，闺女走了。”堂姐妈一愣，“走了，上哪？”堂姐爸小声念纸条：“爸妈千万别上火，闺女是到关内上学去了，保证没事。千万别到处找她，也别声张，别声张。切切。”

不识字的妈才知道小纸条上的大事，只顾流泪。当爸的毕竟有点文化，他注意到“别声张，切切”五个字里有文章。是啥？他整不清楚。不过，这几个月小鬼子投降了，老毛子（指苏联红军）来了满街晃，又传说八路军能来这些事，再联想到平日里姑娘的言谈，他心里好像有点底儿，姑娘肯定不是干坏事去了。因此，他没太急，还一个劲儿劝说女人别哭坏身子。这事也就慢慢过去了。

一晃三年，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了。不几天，长得比以前壮实了的堂姐忽然回来了。一身土黄色军装，腰里还扎着皮带，别把小手枪，真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好女子。经她一说，家里人才知道，原来搁早她就是地下党的交通员了，只不过有纪律，不能说。三年前出走，是有紧急情报要送出去。这回，她是从山东回来的，她是共产党宣传队的干部了。

院里的大人们时常神秘地问她“八路”是咋回事，共产党是干啥的。我们小孩子，不明白那些，可就爱听她讲打仗的事。有一天，大伙都在院子里闲聊，她正好办事回来。她说我教大家唱支歌吧，会唱这支歌，全都心明眼亮，啥事你就都明白了。大人们脸露怀疑，嘀咕着：姑娘家家的，当众唱什么歌呀，我们小孩子欢迎，使劲儿拍手。

我家有块原先记账的黑板，堂姐搬来，就在那上面写字。还写了些数字，说是歌谱。那时我刚上二年级，有的字不认识，啥叫谱，不明白。堂姐说，这歌叫《跟着共产党走》。随后，她把歌词念了一遍：“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中国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堂姐说一句，讲一句，等大伙都明白是啥意思了，她就一句句教我们唱。说实在的，那时我们小孩还不会唱一支完整的歌，就会哼哼《满江红》《苏武牧羊》，还会说些打老蒋的顺口溜。听她一唱，觉得挺好听，歌里说的事也明白，好记，没用两遍，我们小孩子就全会唱了。大婶大嫂们不好意思张嘴，只是笑。我大姑夫在河北老家是打鱼的，他大儿子跟八路军走几年了，他是听说儿子打完锦州到了沈阳，才和我大姑从辽中县找来到了我家的。可没想到扑了个空，儿子又随部队走了，他们就住在了我们家的大院里。他知道的事多，在院子里一群老爷们儿中有威信，他没唱歌，可嘴不闲地嘀咕着歌词。他问我堂姐，跟共产党走没错，这不打跑了小日本，又打败了老蒋，可这永远跟着走，是为了啥？还打谁？堂姐说跟着共产党走，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走，我们都过好日子。我姑夫又问，大伙都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还跟着走不？堂姐说还跟着走，还要建设新中国，大伙过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更好的日子，再把咱中国建设得强大起来，你看谁还欺负咱。围坐在一块的人都笑了，这个说“这就好，这就好”，那人点头说“跟着走，跟着走”。当天晚飯，家家虽说还是吃高粱米粥，苞米面窝窝头，可听那说话的声，都比平日响亮，有劲儿，脸上也都笑呵呵的。我们小孩子见大人高兴，心里也乐呀，这回上胡同玩去，闹去，他们一定不会管了。

堂姐在院里住的一个多月里，时常给我们一帮小孩子说故事。说跟着党走的英雄们。说刘胡兰为了掩护亲人埋藏粮食不怕牺牲的故事；说王二小放牛郎，引鬼子进了我军包围圈。“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在我们心里扎下了根。是啊，人有了灯塔就有了方向，跟着它走，就能为人民干出大事。当时，大院、小胡同，人们说话办事全是笑呵呵的，觉得浑身有劲儿。忽然一天，跟谁都没打招呼，堂姐她就又走了。听说是进了关内，又说是下了江南。院子里有个老师，他对院里一帮老爷们儿说，你们不懂，人家这叫继续革命，啥事要是不继续了，那就要完蛋了。对这些，我们小孩整不明白，不过她教的歌，我们从来没忘，院里、胡同里的大人小孩都没忘。我还唱给同学们听，还给他们抄过歌词，都说这歌好学好唱、好听、好记。

一晃几十年，上学，工作，我经常哼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永远跟着你走”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因为，看一看这些年城市乡村的变化，看看现在我们吃的用的，看看现在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是祖国、人民的“灯塔、舵手、核心”啊。

最初的灯盏

□海默



车子一拐进村路，扑面而来的，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林荫大道，高大的洋槐枝叶繁茂地分立两边，撑起了一道浓密的绿伞，车子在奔驰，这盛装的阵仗让人心情也随之畅快、开阔起来。洋槐树后面，稻田在8月的阳光下，闪着绿色的光芒，一直铺陈到天边。宁静又欣欣向荣。这是我对于沙岭镇的第一印象，这里的百姓，生活得富足、安逸，花园一般的乡村图景让人惊叹不已。

我从稻田的绿色海洋里收回目光，向前方望去，在视野的尽头，两排护路的洋槐归于一点，那一点的后面，大约就是沙岭镇尖台子村了吧。

我们一行人在一处民宅前停下车，普通的院落，两间坡屋顶的青砖瓦房，屋顶被稻草覆盖着，一簇簇的稻草像花朵一样整齐地开在旧屋顶，小巧、别致，窗户还是东北典型的木框玻璃窗，蓝色的油漆斑驳，很有年代感，小时候的记忆，现在看到这样的草房，亲切感油然而生，这是童话一般的存在。

据村长介绍，这是解放前村里大户刘纯猷宅院五间正房的东半部，坐北朝南的房子，经过村里老一辈村民确认，超过百年历史。

走进房间，与普通村民的房子不一样的，是这里没有锅碗瓢盆的烟火气息，房间的东墙上挂着一面党旗，一张旧的长条木桌子放在中间，两只长条木凳分置两边，北墙上贴着一张宣传简报——盘锦市第一个党支部。这间简陋的草房，是起点也是圣堂，它带着一束光，辐射着这片从荒凉走向繁茂的土地。

这是我第一次来沙岭镇的第一党支部旧址参观。我努力地在那些旧痕里，寻找着当初的蛛丝马迹，斑驳的墙壁上，除了岁月，只有党旗是新鲜的，连同我的心跳也是。在跳动的灯火映衬下，曾经有多少地下党员宣誓的场景定格在了那里，庄严地举起右手，一张张坚毅而笃诚的面孔，吐出的誓言，仿佛低音区的弹奏，酝酿着雷霆之力，足以扫除一切阴霾，让信仰打开一扇门，让无数的人找到光明的彼岸。

这是1947年的夏季，芦苇浩荡，草木葳蕤，历经战火的洗礼，东北战局逆转，东北民主联军不断扩大着对东北城市和乡村的控制，一村一城地建立起政权组织，发动群众自救，同时鼓励人民群众也参与到支援前线的作战中，全民皆兵，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从星星之火迅速强大的原因之一。

“此时，取得东北战场的胜利已成定局。经省委、土改总局、地委三级核定，明确接收方案和各县领导班子组建方案，盘山方面组建了县工委又称‘分团’共60人，于1947年12月下旬进到我军控制区海城属地高力房镇，距沙岭18华里暂驻。此间县工委在那里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四项决定，其中第一项就是成立盘山机关党支部（第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由沙岭片长（不久片改区）柳景阳兼任，这就是盘锦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

旧址的北墙上，上面赫然写着第一个党支部书记：柳景阳。下一行，委员：王石、王振海。其中一个名字吸引了我。

王振海这个与我的父亲同名同姓的老前辈，成为盘锦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委员的时候，我的父亲大约只有几岁，后来，父亲也成为了一名党员，这是不是一种传承呢？

在这片黑土地上，从第一党支部走出来的第一个本土党员叫宋桂森，他出生于盘山县胡家镇，身世贫苦。盘山解放后，积极投身到抗联会的工作，一颗被旧制度压榨已久的心，迸发出的热情，让一个年轻人焕发出无穷的力量，他感受到了信仰的召唤。1945年10月，宋桂森入党，在困苦中寻觅光荣和梦想。辽河岸边，他第一个举起的右手，成为一种标识。嘉兴南湖红船上的灯火，终于燃到了还处于荒僻中的辽河入海口。

至1949年，全县已拥有23个支部255名党员，他们如255棵思想的芦苇，慢慢长成了如今浩瀚的芦苇荡，郁郁葱葱地在盘锦大地上，闪耀着绿色的光芒，让她富裕，让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019年的夏天，当我再一次来到沙岭镇，这里已经是中共盘锦市第一个支部党员教育基地，旧址得到保护和修缮，在此基础上，扩建了纪念馆和纪念馆。

这座总建筑面积2544平方米的党建基地，有1351平方米的展厅，一楼是党史，二楼是党建，四个展览大厅，梳理了从1923年第一个踏上盘锦大地的共产党员到1948年盘锦市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这片盐碱湿地上，留下了无数共产党员领导盘锦人民的斗争历史、奋斗历史。

一走进党建基地大门，党旗广场中央一块巨石上毛泽东主席的草书“为人民服务”五个猩红的大字跃入眼帘，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举着星星之火，历经血雨腥风，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走向今天的辉煌。在党建纪念馆，70幅红墙绘画，展现了第一个党支部在盘山沙岭镇的革命斗争历程，目光抚过每一幅画，亦真亦幻，想象、复原，踏着铁马冰河而来的第一个党支部书记柳景阳，在极寒的暗夜里，为盘山县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治理匪患点燃了最初的灯盏。彼时，乡亲们口中称颂的老柳才19岁，他是党支部书记，是武工队的连长，也是沙岭区的区长，19岁的肩膀，那么坚定地带领群众扛起了反抗的大旗。曾经，他就住在这个第一党支部的茅草房里，这栋普通的民宅，日里的炊烟成为乡愁，夜里的灯盏就是方向……

后来，第一个党支部成了县委、县政府工作处。当时的沙岭镇成为盘山县党政军首长驻地，盘山第三次解放前的革命中心。仿青铜的浮雕，栩栩如生地复原了第一党支部成立时候的场景。以目光抵达视觉之岸，历史的表情里，铺陈的举手投足，都是一道让人浮想联翩的风景。而彼时的波诡云谲，让这些先驱者以生命做抵押，三进两出地在盘山境内，与国民党反动势力抗衡，笑到最后的，一定是心怀劳苦大众的一方。

而此时的特写镜头，从沙岭镇第一个党支部移开，蔓延到四千平方公里的范畴，吉祥的丹顶鹤落脚的地方，已是灯火闪烁的海洋，天上人间，璀璨的夜，惟有最初的那盏灯最亮……



大伯的遗物是一小沓发黄的白棉纸，污痕斑驳、边残角缺。其中一页是“出征抗联人家属证明书”，署有“陆军暂编第十八师第二团第三营第七连上等兵”，落款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也就是1943年。七页纸是他写的七封家书。

大伯与父亲一样，大字不识。从那些字迹不同的毛笔书法中，我猜测应该是他口述花钱请人代写的。果然，我在一封信中看到“买寄信纸钱没有，所以久未通函”的表述。

按照父亲的讲述，大伯被抽丁去当兵，起初到昆明，后来转到大理，最后赴保山。前后三年不到就失去联络，从此杳无音信。而那七封家书，没有时辰印记，只有阴历月份，且大多写的是对母亲及家人的思念与愧疚，我无法分辨书成地点，难以厘清他的足迹脉络。唯一令我揪心和意外的是：七封信中，竟然有五封提到要家里给他寄草鞋。

“我们每月所得俸项除伙食之外只余下壹贰元，你想草鞋卖拾叁肆元国币一双……一双只穿得半几月，其余的时间工作尽是赤脚……希望家中无论如何要代（带）给几鞋子贰双，不可为误……”

“对于鞋方面要请母亲费心代（带）给我二双穿穿，以后待儿回家来敬拜……”

“请母亲从邮局汇二双鞋子与我穿吧！也是对不起母亲了，不过总望母亲艰难困苦都要费心做好代（带）来……”

我把大伯的信念给父亲听，他表情凝重，久久沉默，最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大伯的草鞋都是我打好寄给他的。我13岁就会打草鞋了，只是当年连块布渣巾都找不到，没有现在这些耐穿！”

“那他后来究竟下落如何？”

“不知道了。兵荒马乱的，也不知是战死还是病死……”

按照时间推算，大伯活动的轨迹应该是在滇西史迪威公路一带，可能没深入缅甸境内，仅在后方从事抗日物资运输保障工作。人们喜欢说贫穷限制了想象，而我却为大伯屡次要草鞋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看来现实真远远比影视剧里演绎的要艰难和残酷得多。

我曾不止一次在腾冲国殇墓园里仔细寻觅，始终没能发现大伯的名字。他就像一棵山草，湮埋在那个国难当头、血火交织的岁月里。

“你大伯走出松坪哨时，我还往他的包袱里备了三双草鞋。可那次去州城开万人大会，我欢喜过头，急匆匆地只穿了一双草鞋！”父亲说，他最难忘的就是将草鞋穿烂在三十五里坡上。

从平川到山外的县城，得穿过一个四十五里的长箐，然后翻越松坪哨垭口，下一个三五里的山坡，最后在垭子里再走四十多里平路才到县城。脚力差的人，得走一整天。

“那是迎接新社会的万人大会。”父亲说，那年他和平川山区的群众代表兴高采烈地去州城南门外参加了万人大会。一大伙人鸡鸣头遍就摸黑出发，在刺骨的寒风中一路狂奔疾走，下午赶到州城，喜笑颜开地参加了那场热闹欢腾的万人大会。

“就怪晚上的那场联欢会。”父亲接着又说，“打跳最伤草鞋了！”

“那天晚上，我们身穿羊皮褂、脚穿草鞋，不知歇地地唱啊、跳啊、笑啊，高兴的眼泪淌出来多少……”眉飞色舞地描述中，父亲的思绪仿佛又回到当初的情景。

“回来时就丢人现眼了。”父亲说，第二天还路，才爬到三十五里坡半腰，有只草鞋的鞋鼻子处“咔嚓”一声断了。好在父亲还算有办法，光着脚丫在山坡转了半天，终于寻到几丛半长不短、牛羊都不吃的干山草。他耐心地搓成草绳，坡上没有水，就撒尿浸泡。最后用草绳捆绑住草鞋，一颠一簸，总算在深夜回到家。

我感觉，与其说父亲对那次将草鞋穿烂在路上的事刻骨铭心，倒不如说是参加了万人大会让他终生难忘。“解放军带我们翻了身，共产党让我们做主人……”从我小时候起，每当他在小酒微醺之时，总会像念经一样念叨这些他从万人大会上听来的，足以代表他心声的语句。

多年以后，我在《宾川县志》上看到这样的记载：“1950年1月1日，在州城南门外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宾川县人民政府、中共宾川县委成立。”

“岁月如歌，总忘不了那道山坡。那是三十五里坡，坡上长满茅茅草，刺痛我心窝……”

这是我写的《故乡帖》歌中的几句词。有人问：“为什么山坡上的茅草会刺痛你的心窝？”我一时语塞，最后这样回答：“茅草只是一个假借的意象，我更愿意将茅草理解成坟冢。当我开车绕三十五里坡时，弯拐之间，投入眼帘的都是山腰上星星零落的坟冢。我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母双亲……”我没有说出余下的话：“我还想起大伯的衣冠冢，也不知道他的魂儿是否已经回家？”

是啊，如今县城回平川的柏油路宽阔平坦，开车只需半个多小时，每次返乡，往事不意地就会浮现心头，成为难以释怀的遗憾。我常常想：要是我的大伯、父母亲等都还活着，面对今天如此美好的生活，我应该如何去描写写他们的幸福生活啊！

我将大伯日渐模糊的家书小心翼翼地扫描成电子文档，这是一份珍贵的家族史料，每当懈怠之际，我都会不自觉地电脑上打开看看。

草鞋固然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却永远不应该遗忘，因为它伴随着我的父辈走过了饱含艰辛与苦难的人生之路。